

肯尼迪传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美 西奥多·索伦森 / 著
金 铎 / 译



33

文艺出版社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年轻总统

——肯尼迪传

西奥多·索伦森 著

金 铤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宋长琨主编,一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387-1629-7

I. 20… II. 宋… III. 军政人物-列传-世界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0903号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年轻总统——肯尼迪传

主 编: 宋长琨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32 开

印 张: 14

版 次: 200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5387-1629-7

全套定价: 1390元 单册定价: 27.80元



1960年11月9日，肯尼迪当选为第三十四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肯尼迪和他的女儿卡洛琳





1961年6月，猪湾事件后，肯尼迪
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





肯尼迪发表演讲。



1961年，西德总理阿登纳会见美国总统肯尼迪，讨论日益紧张的东西方关系。



译 序

约翰·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1917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一个富豪家庭，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以后他进入全球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学习，大学老师对他的评语是：“一个性格开朗、讨人喜欢、傲慢不羁、相貌英俊但一点也不用功的学生。”然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他喜欢阅读历史、传记和政治学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太平洋作为鱼雷艇指挥员的他因作战勇敢而获得最高奖励。1946—1952年作为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国会议员进入众议院，随后又当选为参议员，1957年成为外交委员会的卓越人物。肯尼迪生来富有，他花起钱来毫不在意，他担任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后来担任总统时的所有薪水都捐献给了慈善事业，共计五十万美元。他非常欣赏爱因斯坦的一段话：“我每天一再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别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辛勤劳动，因此我必须竭尽全力，以便给予别人以等量的东西。”1960年主要由于他的竞选的出色活动而赢得总统的提名。他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他的竞选对手尼克松而当选，1961年元月，他出任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也是第一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总统。

1962年，华盛顿获悉苏联正在古巴安装带有原子弹头的弹道导弹，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十多年的冷战使世界又一次处在一



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如何处理这一严峻的危机，肯尼迪深思远虑，审慎决策，采取了封锁古巴的政策，从而迫使苏联将进攻性的导弹从古巴撤走。肯尼迪在处理这场危机中的坚定态度，使他在国内外提高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声誉。1963年6月，他建议召开会议，最终签订了有限的禁止核试验条约。他的援助拉丁美洲的纲领以及他的“和平队”（试图开展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表明他的兴趣广泛并善于在他的政策中给人以使命感。此外他还关注国内黑人的就业与社会公正，推进种族隔离的废除。1963年11月22日，当他的车队驶进得克萨斯的达拉斯时，为人所暗杀，遇害时年仅46岁。对其早去的悲伤和幻灭感远远超出了美国。

肯尼迪任职时间并不长，但他的大名不仅传遍全球，而且因为他那个多灾多难、神秘而又富贵的家族使他的影响久盛不衰。历史学家对他的功过曾进行了评述，其主要功绩是给国家注入活力，建立了和平队，化解了古巴危机。其最大的失策是猪湾行动，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同时历史学家也给其下了评语：“如果活得长些，他可能是最好的总统”，“避免了核战争”。

作者自1953年起便担任肯尼迪的助手，追随肯尼迪十来载，参与了肯尼迪政府的决策，对其用人情况、决策背景、决策过程有深入的了解。本书对此都进行了详尽评述。因原著篇幅太大，译者进行了删节。



序 言

在浑浊的波托马克河对岸有一片苍翠而平坦的山坡，从林肯纪念碑迤逦伸向罗伯特·E·李的故居。在晴朗的秋天，人们从这座山的半山腰可以看到华盛顿的大部分沉浸在庄严的气象中。三座大理石塑像和纪念碑——为纪念那些在其总统任期内把政治机构缔造成一个代表权力和仁爱的工具的人而树立的——使满怀感激的国民想起，在国家受到最严峻考验的时刻，他们却有幸拥有几位最伟大的领袖。远处，国会大厦的圆屋顶覆盖着的场所中充满智慧与愚蠢、总统的抱负与敌意的对抗、种种政治理想与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的较量。右边矗立着迷官似的五角大楼，它在总统的统率下指挥着关系到我们安危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在这片绿草如茵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铭刻着“应征的美国青年战士之墓”的朴素墓碑。这使我们想起“开国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往左，远在一片绿树屏障的后边，隐藏着一座白色沙岩建筑物，这就是行政权力机关所在地，这里比世界上任何舞台都更频繁地上演着英雄戏剧，有喜剧也有悲剧。

1962年10月20日，就在这样一个晴朗的秋天的下午，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站在白宫二楼后走廊上，凝视着这片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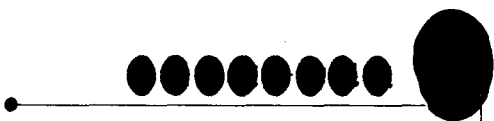
色，谈论着生与死的问题，这个话题以前他几乎从来没有谈论过。他的弟弟，司法部长，同我们呆在一起，有时也有一些其他人同我们呆在一起。在走廊门另一侧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在几分钟之前刚刚开完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核大国，正面临着在具有相互摧毁能力以后的第一次直接的军事对抗。苏联船只将在加勒比海受到美国海军的拦截。因为苏联在古巴岛上设置了导弹，其后果则肯定将影响到全世界。

在那个凉爽的、充满阳光的后走廊上，我们的谈话也有令人高兴的。仅仅三星期以前，我们为了密西西比大学里的一场人权斗争干通宵。这场斗争曾号称为本世纪最严重的宪法危机。总统大概就是想起这件事以及他所肩负的其他重任，所以他走到僻静的走廊上所发的第一句议论就是：“嘿，这个月我们可没有白领薪金。”

我们谈论着他所作出的决定以及刚刚结束的会议。他说，“你不能不钦佩艾德莱^①。即使是与众人为敌，他还坚持自己的立场。”国会选举即将到来，我们谈到这次危机对选举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总统正打算中止作为一位行政首脑所进行的最激烈的中期竞选运动的其余活动。他猜测（事实证明他猜对了），这次危机将使那些一直主张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共和党人得到好处。“你们相信不相信，”他讥讽地说，“霍默·凯普哈特^②是我们时代的温斯顿·丘吉尔！”

① 指艾德莱·E·史蒂文森(1900—1965)，肯尼迪任内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② 霍默·凯普哈特，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主张对古巴实行封锁。



我们谈论着核战争的可能性，语调平静而严肃。正如大约十六个月前的柏林危机时那样，他怀着极严肃的心情关怀杀害儿童的问题——这问题关系到他自己的子女和所有的儿童，他们对大人所犯的错误既不怀恨也没有责任，而他们却比任何人都要蒙受更为深重的蹂躏和屠杀。不到两年前，在他儿子约翰出生之后，他曾经深沉地朗诵培根的这句话：“有妻子儿女的人已向命运交了人质。”这时，他所谈论的不仅是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尚未出世的在内。他说，“如果不是考虑到他们，考虑到那些甚至还没有诞生的婴孩，那么作这些决定就要容易多了。”

战争并不讨约翰·肯尼迪的欢心。一年以前他就说过，战争不再是“一个合理的供人选择的办法了”。在白宫里，他为制止和预防战争所花的时间，比为所有其他问题所花的总时间都要多。这时，战争的阴霾赫然浮现在地平线上。软弱肯定只会促使战争爆发，强硬也不一定就能避免战争。只要他走错一步，辉煌的文明便会毁之一旦，可是即使所有正确的措施，结果也可能还是导致错误的结果。我心里不由得想起他在接受总统提名时说过的的一段话：

全人类在等待我们的选择。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想看看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一试身手。

这时，他突然再一次使气氛轻松起来。“我希望你们认识到，”他笑嘻嘻地说，“白宫的防空洞容纳不下我们所有这些人。”我们互相开着玩笑，说谁有资格被列入进防空洞的名单。

随后，他作了几项指示：在同空军进行一次最后的谈话之后，再决作定；在他于星期一夜晚宣布之前，暂时把决定保密；以及重新草拟他将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的演说。他并没有显出一点狂



热激动或垂头丧气的样子，始终保持着我经常看到的那种满怀信心的镇静。尽管这一星期排满了令人疲乏的会议和行程，他的嗓音还是生动有力，发的命令也是干脆而明确的。后来，我回到自己在白宫西侧的办公室去起草新的演说稿，他的好心情使我感到很振奋，他的热情使我感到温暖，而他的沉着坚定又深深鼓舞着我们。

总统几分钟后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你看到道格·狄龙^①所说的关于丘辟特导弹的那些话吗？”我说我看到的。那天下午的会议曾谈到上届政府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丘辟特地对地导弹很容易受到苏联的袭击，而苏联人似乎有可能想把自己新近设置的古巴的导弹说成是和美国设置丘辟特导弹对等的东西。肯尼迪的财政部长狄龙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国务卿。他当时在会上插话说，实际上是因为上届政府发现丘辟特导弹对美国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才强行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

约翰·肯尼迪说，“我只想知道，你是否确实已记录这个情节，往后好放进我们要写的那本书里。”像往常那样我更正他说，“你是说你要写的那本书吧，总统先生。”

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替他完成宿愿。本书尽可能地反映了他一生中最后十一年所持的见解；尽可能地使用了他的原话和思想；尽可能地说明他的思路。

他有能力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对此我深信不疑。在他进入白宫的头一个月里，他说过：“最近有人说，不论我当一任还是两任

^① 即道格拉斯·狄龙(1909——)，美国狄龙—李德财团的头儿，又是洛克菲勒财团代理人之一，历任美国驻法大使、副国务卿、财政部长等职。

总统，我都会发现自己卸任时正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年龄——再开始搞一项新事业吧，已嫌年纪太大，写回忆录吧，又尚年轻。”但在几次谈话中，他都曾对我明确表示，他打算一离开白宫就写回忆录，至少先写他担任总统期间的经历。这很可能是一部长篇著作的第一部分。

他写的书一定有可能成为一部了不起的著作的。创造了那么多历史的美国总统中没有几个人具有象他那样的历史意识或写作才能，也没有几个人乐于象他那样开诚布公。他不仅能够客观地估量自己的行为，而且深切地关心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当代的选民会怎样评价他的行为。在这方面，大多数政治家都望尘莫及。他自己对于担任公职的回忆将构成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具有翔实的材料、惊人的坦率、既风趣又精炼等特点。为他写传记或编年谱的作家，没有人能指望写得象他自己写得那样好。

但凡想进行这种尝试的人都要明白，肯尼迪不仅是一位历史学者，而且也是历史和传记著作的一位严格的批评家。他凭自己的才能赢得了普利策传记奖金。在他为撰写《勇敢人物的画像》而进行调查研究时，他对优秀传记的贫乏感到惊异。在担任总统的岁月里，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历史取决于写历史的人。当今一贯不正确的新闻报道使他怀疑，研究他这个时代的人将来究竟会对这些报道相信到什么程度。当密西西比州议会就1962年在州立大学内发生的冲突事件拟定一份官方报告时，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肯尼迪兄弟指挥的倒霉的联邦法院执行官员身上。当时总统曾说，这就是下一代学者们将要仔细衡量的那种地方文件。他还说：“这使我怀疑，我所知道的联邦重建时期的种种弊病是否真的全部属实。”

他用最严格的检验尺度来检验他本人的作品，这一点并不足



为奇。他出任总统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有一定的选择余地，那时他对谁为他写传记就已经很挑剔了。他注意到，大部分写他事迹的书籍和杂志文章不可避免地互相抄袭，它们重复着同样的神话、谬误、断章取义的引文，以及先前已经驳斥过的辩解。（极端恶劣的例子之一就是，人们经常反复指责当肯尼迪还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在哈佛大学一个研究班上所发表过的言论。在这种指责已经彻底破产的十年之后，它们居然还在流传。）1958年，他在其接触的出版界人士中花了很大气力去制止一本计划中的他的传记的出版。这本传记的作者在可能接受他的作品的出版商面前自称为肯尼迪的密友。然而，参议员肯尼迪认为此人并没有掌握必要的材料，并且既不客观也不可靠。

他的这种反应部分是由于他对人家的批评过于敏感。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十分关切历史描述的准确性。因此，他在1959年同意把有关的档案和事实无条件、无限制地提供给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教授，供他写作和出版了到他出任总统前为止的唯一的一部严肃认真的传记。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以为伯恩斯会写一首颂歌（伯恩斯也没有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伯恩斯的才能及其在自由派知识界中的地位，将使该书在读者心目中获得预期的价值。

待他进入白宫后，他对历史的关心仍一如既往。他相当注意将要保存他的文件的那所图书馆。新闻界和其他作者很容易受到他的接见，他在公共场合或私下讲话都很坦率且清楚有力，而且总是决心要对问题进行阐明、启发和解释。在他的工作班子里那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要求下，他同意建立一套规定，即要趁参与重大事件的人们记忆犹新之时，把他们知道的第一手回忆材料记录下来。

然而，他太繁忙了，没有时间这么做。他曾作出安排，对重大问题的讨论进行详尽的录音。有时他为了存档，还口授关于会谈的备忘录。但是对许多关键性的决定，他都是通过文字而不是口述，用手谕而不是用电话，对许多人而不是对一个人传达的。在他遗留下的书面案卷中，包括他的演说稿、咨文、电报、信件和备忘录，也只有少数是根据他口授的或亲自拟定的初稿写成的。

但有时，他在处理某些事务时，有意让人觉得他高深莫测。虽然参与内部机密的人比局外人知道的要多许多，但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助手、朋友或其家庭成员，知道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动。我在他的参议院办公室和白宫办公室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使我能够对很多问题都知道一点，可是决不是对任何问题都全面了解。他的动机往往是别人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因为他总避开明显和容易的方式，而且他常常由于急着作出下一个决定，以致无暇解释上一个决定。

有时，他似乎是在暗示我们把重要谈话用备忘录的形式保存在档案里。他那个不准将来写“秘密”回忆录的规定(这项规定来自玛格丽特·杜鲁门^①向他提出的一项善意的告诫)只适用于管家班子的人员，并不适用于他的职务上的助手。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明白指出，在密谈的时候，如果他认为一个或几个参加谈话的人 would 匆匆地把他们对他的观点的解释记录下来，那末他将感到相当不自在。

他希望有人把他的执政时期写成一部伟大著作，但他又是宁愿亲自撰写这部著作。他相信施莱辛格会写出一部扎实的著作，

① 玛格丽特·杜鲁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著有《哈里·S·杜鲁门》一书。



除此以外，他对大多数官方回忆录和日记的可靠性都表示轻蔑。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演说稿的兼职起草人埃米特·休斯辜负了共和党官员们对他的信任，因为他引用了他们私下的谈话来诋毁他们。肯尼迪说，“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在写那种书。”

本书则不然，甚至称不上是一部不偏不倚的著述。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不可能是一个中立的观察家。我既然对约翰·肯尼迪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就不能装出一种完全超然的样子。我既以将近十一年的时间为他效劳并阐明他的见解，现在就不能用公正的学术性研究的外衣来掩盖起我的党派之见。让我一开始就讲清楚，这是一部歌颂约翰·肯尼迪及其成就的书，这不仅出于忠诚和爱慕，也是出于对他的深切的自豪感和信心。

当然，我却不能把他抬得太高，仿佛是个神，而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理应获得，而且他本人原来也希望人家为他写出一部像样的传记来。生前他并不不要他的顾问对他阿谀奉承；死后他也不会要他的传记作者为他歌功颂德。他并没有夸口说自己博古通今、一贯正确，而总是很直率地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有缺点或知识有限。他把他的许多成就归之于幸运，并且一定乐于把他议论温斯顿·丘吉尔的话用在自己身上：“他虽习惯于战斗的艰难困苦，却并不厌恶享乐。”

传奇故事中的英雄常常是受人爱戴，无往不胜的，但是约翰·肯尼迪却有敌有友，有成就，也有挫折。他比钦佩他和贬低他的人都更为坦率、更为明确地承认这些事实。他喜欢取笑自高自大或荒谬愚蠢的人，不喜欢过于一本正经地看待他自己。同时，他还能嘲笑那些吹嘘他的大话——包括他自己作过的一些吹嘘。

他对“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必须据实而论。就像奥利弗·克伦威尔谈到他的画像时那样，要把一切，包括我们的